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



7

物理维度的历史

纵观历史,自文明曙光初现,原始人为了生存必须进行大量的体力活动（Duncan & Watson， 1960）。在古代,斯巴达人非常重视体育锻炼,他们的体育锻炼由国家监管,并根据年龄确定,男女老少都接受类似的锻炼（Phillips & Roper， 2006）。然而,体育锻炼在哲学层面上始终与身体层面息息相关。以下文献改编自Lynch和Soukup （2016）。

雅典人最早认识到身体素质对提升和影响其他健康维度（智力、情感、社交和精神)的重要性。与雅典人类似,罗马人也认识到体育锻炼对生活质量的益处,但罗马人更倾向于较为温和的运动方式（Phillips & Roper， 2006）。可以说,古代雅典人和罗马人进行体育锻炼的目的与今天的健康与体育教育（HPE)类似,都以身心健康为核心 旨在全面提升身心健康。因此,本章内容与儿童全面发展要素、社区联系（优势视角)以及运动密切相关。

© 作者 2019 T. Lynch，
《体育与健康》， https://doi.org/10.1007/978-3-030-22266-6_7
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

成为、归属和接受体育教育的优先要素（参见图1.1）。

Whipp概括了与“福祉”密切相关的HPE理念的历史和现在的意义。

> 过去,古希腊的理想“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”（Mens sano incorpore sano)强调了身心健康的重要性……这份报告着重强调了以教育为基础的综合性战略健康方法的重要性,并重视健康与体育教育者的作用。（2015,第111页）

正如本书通篇所述,整体健康、体育和体育教育（HPE)对于教育而言并非一个新概念,但近年来,人们更加认识到学习领域对儿童全面发展所做出的贡献,以及身体维度在健康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。

公元二世纪,盖伦解剖人体时,人体客体化的进程就已显现。盖伦并不认为自己看到了什么,他看到的只是他所相信的（Kirk， 1993）。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（1452-1519)是第一个对肌肉及其功能进行精确描述的人,但他的著作直到十八世纪末才得以发表（Broekhoff， 1972）。 1679年,博雷利以机器的比喻来解释人体,并“为理性化的体育锻炼体系的出现铺平了道路”（Kirk， 1993，第14页）。

在中世纪,体育教育与天主教会的关系时好时坏,而天主教会对欧洲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。教会“渗透到文化的方方面面 学术、政治、经济,甚至个人的私人生活”（Mechikoff & Estes， 2002,第104页）。尽管体育教育有时并不得到教会的支持（Lynch， 2004）,但这一时期的一些关键人物,如圣约翰·马歇尔和圣约翰·马歇尔,都曾倡导过体育教育。

多明我（1170–1221）、圣托马斯·阿奎那（1225–1274)和教宗庇护二世（1405–1464）（Feeney， 1995）。这种与教会的联系加强了体育教育与健康精神层面之间的关联（Lynch， 2015）。当今的研究结果表明，“通过确保高质量的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,可以充分发挥其精神潜力”（Lynch， 2015,第217页）。
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

欧洲对体育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意大利教师维托里诺·达·费尔特雷（Vittorino da Feltre,1378–1446)率先将整体体育教育引入学校课程,认为这是培养“理想公民”的必要条件,涵盖身、心、灵三个方面（Phillips & Roper， 2006）。另一位欧洲教育家约翰·弗里德里希·古茨穆特斯（Johann Friedrich GutsMuths,1759–1839)因其对体育教育专业化的贡献而备受赞誉。当时,德国与瑞典和丹麦一样,将体育教育主要视为军事训练。因此,体育教育的重点在于操练和锻炼,强调强制、纪律和控制,而非乐趣（Kirk & Twigg， 1993）。古茨穆特斯在德国施内普芬塔尔教育学院制定了一套体育教学大纲。该大纲成为体育教学的基础,主要内容包括体操（Phillips & Roper， 2006）。瑞典的佩尔·林（1766-1839 年)是第一个宣传 PE 的医学益处的人,他经常将其与科学论述联系起来,并提倡各种健康方面。

在近代晚期,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,被称为“组织”的管理机构数量不断增长，以代表人民的利益。
威廉·G·安德森被认为是如今的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协会（SHAPE America）的创始人,他于1885年创立了该组织。2014年,美国健康、体育、娱乐与舞蹈联盟（AAHPERD)的理事会更名为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协会（SHAPE America）。这是AAHPERD自成立以来第七次更名,其最初名为促进体育教育协会（AAPE）（Yang， 2015）。自Per Ling时代以来,体育教育取得了显著发展,并且“在许多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”（Kirk， 2013,第974页）。

在全球范围内探索体育教育,考虑到柯克（Kirk)所指出的发展趋势,以及协会代表着不同人群的特点,我们不能忽视国际健康、体育、娱乐、运动和舞蹈理事会（ICHPER-SD)的影响。尽管体育教育领域目前尚无统一的代表机构,但ICHPER的影响力不容忽视。ICHPER的成立旨在让教育工作者“能够在国际范围内开展合作……该协会不代表任何单一国家、体系或体育教育方法”（Hircock， 1988,第73页）。ICHPER-SD由AAH-PERD（美国体育、健康、娱乐、运动和舞蹈协会)发起,该协会于1958年在意大利罗马成立,首届ICHPER世界大会的主题是“儿童健康与学校”。
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

本次世界大会提议促进体育锻炼的健康维度。
科尔宾表示,这一点在当时是一致的,“是‘新’的核心”。
“体育教育是对孩子全面发展的教育”(Corbin, 2016,
第 14 页)。
ICHPER-SD对世界许多国家都产生了影响,
确实承认了一种类似于雅典人的 HPE 方法。其中之一
直接影响发生在1970年澳大利亚悉尼的ICHPER-SD会议上。
这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大洋洲举办的世界大会。澳大利亚理事会
健康、体育和娱乐(ACHPER)正式名称为
即澳大利亚体育教育协会(APEA),
更名是 ICHPER-SD 会议的直接结果。正如 Kirk 所引述的。
麦克唐纳在会议报告中指出,“大会表示……”
“我们澳大利亚现在也是国际舞台的一部分”,而且这可能已经
这种国际间的联系感(归属感)
ICHPER以及此次会议的巨大成功促成了
接受澳大利亚版本的这个名称”(1998年,第6-7页)。
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在以下十点中的第一点中有所体现:

1970年国际人机交互研究与教育委员会(ICHPER)世界大会决议:

1. 健康、体育和娱乐是密切相关且相互联系的领域,应为了社区的最大利益而进行协调。
(ICHPER, 1971,第189页)

此外,正如柯克和麦克唐纳所引述的,伊莱恩·墨菲(1988-1993年美国大学体育与运动教育协会全国主席,国际大学体育与运动教育协会南达科他州分会大洋洲副主席)指出:“我们对体育教育的描述并不充分,因为健康是(我们所做的)如此重要的组成部分……他们
他们希望把这些词加进去,否则他们觉得体育课就不合适了。
范围太窄了”(1998,第7页)。ICHPER-SD“也指导了相关工作
面向发展中国家,旨在启动和加强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项目和
领导力”(Kane, 1989,第107页)。虽然ICHPER-SD仍然是一个分支机构
如今,SHAPE America 的总部也设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雷斯顿。
由独立的机构管理和运营。然而,近年来,此类国家机构
国际组织发现,他们越来越难以做到这一点。
维持会员数量,从而保持财务上的可行性。这已经
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

在科技进步使得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,人们被迫思考自身的目的和需求,例如:

通过社交媒体。

以健康预防为重点的健康管理涉及联系和合作。这种观点为教育提供了指导。

各部门和政府在学校实施健康、体育和教育 (HPE) 时,以及
体育运动通常在社区内开展。大趋势预测,未来,
教育部门需要做好准备,应对世界资源有限、世界经济从北向南、向西转移的局面,以提高生活质量。
向东;相关的医疗保健成本以及生活方式和服务方面的应对措施;以及社会关系日益增长的重要性(Hajkowicz、Cook、
(& Littleboy, 2012)。然而,正如文献所表明的那样,有限的资源
在整个现代历史中,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H/PE,并且至今仍然存在。
当今的问题(Cale & Harris, 2019;澳大利亚联邦, 1992;
(Hardman, 2008;联合国教科文组织, 2008,2014)。此外,当面临
由于资源有限,教育工作者更容易通过采用行为主义方法来实施体育教育,但这反而阻碍了健康教育的开展。
(Westbrook、Durrani、Brown、Orr、Pryor、Boddy、Salvi, 2013)。

HPE相关领域的合作关系遵循“优势导向”原则。
这种方法“支持对健康教育的批判性观点”
关注学习者在社区结构性促进因素、资源和制约因素中的位置,并通过资源导向型教学方法来实现。
提高学习能力的方法” (Macdonald 2013, p. 100)。
安东诺夫斯基的健康生成理论就是一个基于优势的方法的例子。
该模型包含:

·更注重推广健康生活方式,而不是
预防疾病;
将健康生活视为多维度和全面的概念
包括生理、社会、心理、精神、环境和社区等各个方面;

·将健康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,始终处于变化之中。
成为;
·将健康视为比……更多、更特别的东西
无疾病;
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

·承认人类是积极的行动者,生活在与其环境相关的关系中
住所;以及
·健康本身不被视为最终目标,而是被视为美好生活的重要前提（McCuaig、Quennerstedt
和 Macdonald， 2013 年,第 113 页）。

从健康促进的角度,特别是通过伙伴关系,采取基于优势的方法,倡导为生活和福祉做好准备,使知识和技能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中转移和调整（Lynch， 2016）。

有证据表明,整体性健康与体育教育（HPE)理念自雅典时代起就已存在并不断发展,并在20世纪蓬勃发展,尽管当时它被称为“体育教育”。如前所述,罗宾斯、鲍尔斯和伯吉斯提出了健康（HPE理念)的七个维度,统称为健康:身体、智力、情感、社交、精神、环境和职业。此外，“这些维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联系” （2011,第9页）。研究表明，“所有学校都应该重视HPE,因为它能够以整体的方式提供各种机会”（林奇， 2015,第217页）。纵观历史,体育教育一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,它始终如一地用来代表多种论述、意识形态、哲学和运动发展的各个方面。

对历史的探究表明,体育教育深受两种哲学思想的影响:(1) 将身体视为客体;(2) 关注人的整体观,包括身体、心理、精神和福祉。理解这两种哲学思想至关重要,因为体育教育是社会建构的产物,其语义也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演变。

文献表明,在历史上,体育课有时扮演着“训练”身体的角色,将身体视为一个客体。

当“男人（和女人)能够将自己的身体视为一件物品”时,身体客体的概念便会出现在社会中（Broekhoff， 1972,第88页）。Kirk将这一概念描述为“一个有用且受控的身体,它具备适当的技能,能够满足任何特定社会可接受的社会行为标准,并在经济体系中做出生产性贡献” （1993,第13页）。重申一下,相关的体育教育话语也应如此。
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

影响这一哲学的因素包括军事、科学、健康和体育 这些因素体现了性别歧视、精英主义、健康主义、个人主义和中胚层主义等意识形态 这将在下文中进行更详细的讨论（参见）。
第九章）（Colquhoun， 1991,1992； Hickey， 1995； Kirk， 1992； Kirk & Twigg ,1993； Scraton， 1990； Tinning， 1990； Tinning & Fitzclarence， 1992； Tinning,Kirk & Evans， 1993）。其中,学生在学校环境中无意间习得知识和态度（Kirk， 1992）。此类意识形态被认为存在问题,因为它们传递了错误的信息（Kirk， 1992）。由于这种“身体作为客体”的理念主要采用行为主义的健康教育方法,因此用“学校化”身体来描述这种理念是恰当的。

社会文化方法的引入标志着体育教育理念的转变,并引入了“整体性”话语。这种整体性观点受到包容性意识形态的影响,在世界某些地区被重新命名为健康促进体育教育（HPE）。这种转变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,但最近一次是作为一种复杂的反驳话语出现,旨在对抗那些与“身体作为客体”哲学相关的观点。这种话语改变了人们对身体的认知,不再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客体,而是将其视为一个“完整的人”:身、心、灵和福祉。

参考

Broekhoff, J. (1972). 体育教育与身体的物化。体育-
sion， 4,4–11。

Cale, L. 和 Harris, J. (2019)。在学校推广积极的生活方式。香槟市，
IL:Human Kinetics。

Colquhoun, D. (1991). 基于健康的体育、健康主义意识形态和受害者有罪论。体育教育评论,14 （1） ,5-13。

Colquhoun, D. (1992). 技术官僚理性与体育课程的医学化。体育教育评论， 15(1)，5-11。

澳大利亚联邦政府。(1992)。体育教育 参议院环境、娱乐和艺术常设委员会报告。堪培拉,澳大利亚首都领地:参议院印刷局。

Corbin, C. (2016). 体能素养对研究和实践的影响:评论。运动与锻炼研究季刊,87（1） ,14-27。
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

Duncan, R. 和 Watson, H. (1960)。体育教育导论。纽约：
罗纳德·普雷斯。

Feeney, R. (1995).天主教视角：体育锻炼与运动。利斯堡，
VA：阿奎那出版社。

Hajkowicz, S.、Cook, H. 和 Littleboy, A. (2012)。我们的未来世界：将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全球大趋势。检索自http://www.csiro.au/en/Do-business/Services/CSIRO-Futures/Futures-reports/Our-Future-World 。

Hardman, K. (2008). 学校体育教育：全球视角。运动机能学，40，5-28 。

Hickey, C. (1995). 体育教育可以算是体育教育吗？ 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，
42(3)，4-7。

Hircock, B. (1988). ICHPER 的历史。 《体育与舞蹈杂志》，
59(2), 73。

Kane, J. (1989). 国际健康、体育和娱乐理事会 (ICHPER).国际教育评论, 35(1), 107。

柯克，D.（1992）。体育教育、话语与意识形态：揭示隐藏的
将课程纳入视野。Quest ，44，35-36 。

Kirk, D. (1993).身体教育与文化：专著。吉朗，维多利亚州：迪肯大学出版社。

Kirk, D. (2013). 体育教育中的教育价值和基于模型的实践
阳离子。教育哲学与理论， 45(9)，973-986。

Kirk, D. 和 Macdonald, D. (1998)。体育活动专业的发展历程：团结、多样性以及澳大利亚健康、体育和娱乐委员会 1970–1997 年的发展。 《体育传统：澳大利亚体育史学会杂志》， 15(1)，3–24。

Kirk, D. 和 Twigg, K. (1993)。澳大利亚学校体育训练的军事化：初级学员训练计划的兴起和消亡，1911-1931 年。
教育史， 22(4)，319-414。

Lynch,T. (2004). 天主教教育视角下的学校健康、体育和体育课程的重要性。ACHPER健康生活方式杂志， 51(2–3)，7–11。

Lynch, T. (2015). Investigating children s spiritual experiences through the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learning area in Australian schools.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, 54 (1), 202–220.

Lynch,T. (2016).健康、福祉和体育教育的未来：通过本地和全球社区伙伴关系优化儿童的健康和福祉。
伦敦：帕尔格雷夫·麦克米伦出版社。https ://doi.org/10.1007/978-3-319-31667-3。

Lynch, T., & Soukup, GJ (2016). “体育教育”、“健康与体育教育”、“体能素养”和“健康素养”：全球命名法
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

真正的困惑。《Cogent Education》，3(1),1217-820。https ://doi.org/10.1080/2331186X.2016.1217820。

Macdonald, D. (2013). 新的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:课程改革渐进主义的案例/理由?亚太期刊
健康、运动和体育教育,4 （2）,95-108。

McCuaig, L., Quennerstedt, M., & Macdonald, D. (2013). 有益健康,
以优势为本的方法作为指导健康、体育和体育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。亚太健康、运动和体育教育杂志,4 （2）,109-125。

Mechikoff, R. 和 Estes, S.（编）。(2002)。体育与体育教育的历史与哲学:从古代文明到现代世界。波士顿:麦格劳-奎松出版社。
爬坡道。

菲利普斯,M.和罗珀,A.（2006）。体育教育史。载于D.柯克，
D. Macdonald 和 M. O Sullivan（编），《体育教育手册》
（第 123-140 页）。伦敦,英国:Sage 出版社。

Robbins, G.、Powers, D. 和 Burgess, S. (2011)。健康的生活方式（第 9 版）。
纽约:麦格劳-希尔出版社。

Scraton, S. (1990).性别与体育教育。吉朗,维多利亚州:迪肯大学出版社。
大学出版社。

国际健康、体育与休闲理事会（ICH-PER）。(1971)。国际健康、体育与休闲理事会第十三届国际大会。载于第十三届国际大会论文集。

ICHPER 大会。澳大利亚悉尼,1970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3 日（第 2-189 页）。
华盛顿特区:国际健康、体育和体育理事会
娱乐。

Tinning, R. (1990).意识形态与体育教育:打开潘多拉魔盒。维多利亚州吉朗:迪肯大学出版社。

Tinning, R. 和 Fitzclarence, L. (1992)。后现代青年文化与危机
在澳大利亚中学体育教育中。Quest ,44 （3）,287-303。

Tinning, R., Kirk, D., & Evans, J. (1993). 健康主义与日常体育教育。载于迪肯大学（编），《体育教育批判课程视角》。
教育:读者（第 77-94 页）。维多利亚州吉朗:迪肯印刷服务公司。

联合国教育、科学及文化组织。(2008)。亚洲体育教育和运动的创新实践。检索自https://
unesdoc.unesco.org/ark:/48223/pf0000158509。

联合国教育、科学及文化组织。(2014)。
全球学校体育教育调查。检索自https://unesdoc。
unesco.org/images/0022/002293/229335e.pdf。

Westbrook, J., Durrani, N., Brown, R., Orr, D., Pryor, J., Boddy, J., & Salvi,
F. (2013).教育学、课程、教学实践和教师教育

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

在发展中国家。摘自https://assets.publishing.service.gov.uk/government/uploads/system/uploads/attachment_data/file/305154/Pedagogycurriculum-teaching-practices-education.pdf 。

Whipp, P. (2015). 优质健康与体育教育 :促进身心健康。运动与锻炼医学开放期刊， 1(3),111-113。

Yang, D. (2015). 2015 年 ICHPER-SD 论坛特别备忘录。弗吉尼亚州雷斯顿 :国际健康、体育、娱乐、运动与舞蹈理事会 (ICHPER-SD)。